重庆用歌声撑起抗战脊梁

——《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研究》读后

80年前的8月15日，是一个铭记历史的重要日子，那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回首那段烽火岁月，除了枪林弹雨，在重庆，音乐也在抗战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激昂的歌声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本期推出这篇书评，希望能让大家从音乐视角，认识伟大抗战精神的强大凝聚力。

——编者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洛秦

当我们提起抗战时期的音乐记忆，脑海中或许会率先浮现出《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或是延安革命歌曲的豪迈。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群山环绕的重庆，曾上演过一场波澜壮阔的音乐抗战史。汤斯惟所著《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研究》，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这座城市尘封的音乐档案，让我们看到战火纷飞中，音乐如何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强大力量。

抗战时期的中国，在延安、上海、重庆这三座城市，因各自特殊的政治环境，孕育出截然不同的音乐文化。延安是革命圣地，那里的音乐充满了热血与信仰。《南泥湾》欢快的节奏，唱出了八路军战士自力更生的乐观精神；《黄河大合唱》如汹涌波涛，激荡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这些歌曲就像战斗的号角，激励着人们为了理想奋勇向前。

上海则是另一番景象。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在战乱中形成了“孤岛”文化。百代唱片公司的留声机里，传出周璇、白光等歌星演唱的时代曲，诉说着乱世中的儿女情长；而街头巷尾，《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也此起彼伏，表达着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抗争。上海的音乐，既有小资情调的柔美，又有抗争精神的刚烈。

重庆，这座在战火中成为抗战大后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有着独特的音乐气质。1937年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一时间，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涌入这座山城。棚户区里住满了难民，街道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更糟糕的是，日军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大轰炸，山城终日笼罩在硝烟之中。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重庆的音乐文化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新华日报》等媒体不断报道抗战新闻，宣传抗日精神；音乐团体纷纷成立，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组织音乐家们创作抗战歌曲；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激昂的旋律，让抗战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街头巷尾，群众合唱团的歌声振奋人心。重庆的音乐，是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是在战火中跳动的希望。

在这本书中，作者像一位考古学家，深入挖掘出重庆抗战音乐的珍贵史料。她翻阅了64种期刊、32种著作、3种档案史料，从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梳理出重庆音乐的发展脉络。这些史料，就像一块块拼图，拼凑出了重庆音乐的完整面貌。

书中既采用了文献学、历史学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整理相关档案、报刊书籍及历史文献资料，又在充分翔实的基础上，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战时重庆从乐政、乐教、乐人、乐事、乐书、乐曲、乐团、乐思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从内容和结构上来看，该书系统考察了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年）重庆音乐文化发展全貌，通过九大专题揭示战时中国音乐转型的特殊历史轨迹：一是政治格局塑造音乐生态。二是教育体系创新突破。三是音乐实践多维展开。四是思潮碰撞与历史定位。研究表明，战时重庆音乐兼具国家意志表达、民众精神动员和艺术本体创新的三重属性，奠定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基础。

笔者注意到，作者在书中清晰阐述了一些核心观点。

首先，彼时重庆的红色音乐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团结精神、爱国情怀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其次，此类音乐极大地凝聚了人心，使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并且培育了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投身创作的音乐人才。再者，这一时期的重庆音乐创造了诸多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储备了大量音乐人才，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这段历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失了它，音乐史便不完整。

当下学界常提及“重写音乐史”，笔者认为该书在这方面进行了诸多新的尝试，突破了一些传统范式。

其一，发掘了众多以往未曾使用过的新资料。该书专门整理了重庆抗战时期的旧档案，如教育部的存档、音乐学院的旧资料等。这些资料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当时重庆音乐的整体状况，也使那段音乐史更具立体感。

其二，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以往被忽视的重庆。以往谈及抗战时期的音乐，往往侧重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而重庆鲜少得到深入探讨。实际上，当时的重庆不仅是政治中心，文化艺术也十分活跃。此地的音乐并非仅用于娱乐，更承载着强烈的爱国与动员使命。该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这段历史，不仅为重庆本地音乐史增添了重要资料，也为抗战音乐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书中还特别关注了流亡至重庆的文化人。作者整理了缪天瑞、李凌、贺绿汀等音乐人的相关资料，他们不仅在重庆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提升了当地民众的音乐素养，也为全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书中并未忽视普通民众的音乐生活，如街头小调、集会上的歌曲等，这些都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情感，也体现了民众如何通过音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其三，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社会、文化和音乐等多个视角相结合。例如，从历史角度探究当时的政治局势、社会动荡对音乐创作的影响，以及音乐如何反过来激励民众支持抗战。这种多学科融合的方式，契合了“重写音乐史”所倡导的新方法，使我们对那段音乐史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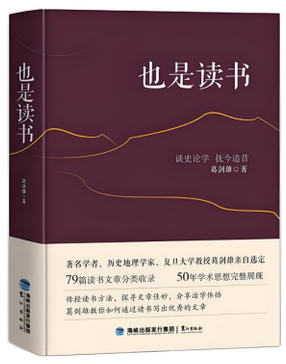
通过阅读该书，让读者了解到，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重庆，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抗战大后方音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战时音乐繁荣景象，成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一座高峰和丰碑。此书不仅填补了音乐史研究的空白，更让读者听见了一个时代如何在琴弦与战鼓的和鸣中，铸就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韧与辉煌。

（作者为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百本好书送你读]

光阴里的绚丽花朵

——读葛剑雄《也是读书》有感



■相海龙

葛剑雄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知名的文化学者。今年年初，作为“陆海讲读堂”第二期的讲读人，他与重庆读者们分享了“何以中国”。他的随笔集《也是读书》，也成为第57期“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书目。

葛先生著作等身，却不是一位“沉闷”的学者，近年来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上有很高的活跃度与知名度，也正因为他所具有的严谨治学的功底、广泛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一直受到大家的热捧与喜爱。他的这本《也是读书》面世以来，就收到了无数点赞，颇受好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立深有感触地说，书中“文章包罗万象，上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地理、文化，剖析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并且通过现身说法，将如何读书等话题娓娓道来，给人以启迪。”

《也是读书》在读书的话题上另辟蹊径，给了读者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获取到一种完全崭新的触动。如何读书？这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实质上里面蕴藏着很深的学问。读书，是贯穿于每一位读书人一生的追求，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为什么要读书。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人生三问”一样，这“读书三问”，也是始终绕不过去的哲学命题，一直考验着读书人的心智，当然答案林林总总，却又千差万别，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爱读书，读一辈子的书”，但不能够“死读书，读死书”。无疑，葛剑雄在《也是读书》中给出了大家清晰明确且获得高度认可的答案。

《也是读书》写作时间横跨50年，集中呈现了作者在读书上的深厚积累与深刻思考，详细再现了其治学生涯中的心路历程，完整体现了一位人文学者内心深处的不懈坚守，透过这些回忆与感悟，让读者得到了重新探索读书、治学的精神价值和现实意义。葛剑雄在自序《我们应有的反思》中写道：“只要不断反思，即使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也能逐渐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时，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思过，而是思得不够，要永远思下去。”读而思，思而读，这种赓续往复，终究会淬炼成为打磨一个人鲜亮人生的合金链条。

《也是读书》收录了作者70余篇文章，主要包括序、跋、引言、后记和随笔等，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作者多年来的学术追求，也展示了他对整个社会的独到观察，可谓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笔法老辣，文风敦厚，既像甘露，犹如陈酒，清冽而芳香，带给了大家特别的阅读享受。作者颇具匠心，以“读自己的书”“读我编的书”“读他人的书”“读研究生的书”等为主要架构，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布局紧凑，既有序地叙述了个人作品的创作主旨和经过，又有对朋友和同道等人著作的用心客观点评，还有对自己学生作品的深情寄语。透过这些高质量的文章，作者的学术研究之精，涉猎之广，可见一斑，才使得他能够自如地在博古通今和纵横捭阖里，用文字为大家创造出悦目的连绵风景。读罢这些文章，发现既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又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充满了读书的高雅乐趣和人生的细致省思，极好地展示了作者在学术上的深入研究以及在写作上的认真思考。

书，永远是读书人最佳的伴侣、最好的朋友与最亲的知音，是一种永远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不离不弃。在葛剑雄《也是读书》翔实的文字叙述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与书相关的浓厚趣味，其中的借书、购书、藏书和护书等内容，在字里行间荡漾着光阴的动人和有趣故事，有年少时期读书时甘霖滋润的愉悦，有青年时代刻苦求知中的艰辛，更有人到中年后对读书的一份理性与笃定，正是这一份难得的理性与笃定，却在人生的一个个转角处，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作者在书中以“碎石”作为一种隐喻，为大家昭示出读书和求知的路径，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刚性需求。他说，“碎石的个体是坚硬的……碎石的团体是灵活而富有韧性的……碎石可以一时被尘土或积雪覆盖，但尘土和积雪不能持久，而碎石永远存在。”实际上，碎石不“碎”，正是这一块块看上去不起眼的“碎石”，可以很好地铺就了一个人不断前行的人生道路。

在当今社会，自媒体的极度嘈杂，人工智能的急速裹挟，人们面对着过多的诱惑，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如何找到破解的“良药”，葛先生这本真挚而厚重的文集，或许能给人们许多沉淀的勇气，可以让每一个人在与作者静心对话的同时，能够从内心里升腾起勇往直前的力量。

《也是读书》既是葛剑雄关于读书的一次深入分享，更是对知识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一场深刻探索。尤其是在当下，当更多的人们再也离不开各种屏幕的时候，它起到了急切呼喊的作用，意在让人们能够回归到纸质书本里，重拾阅读的美好初心，汲取沉淀在日月里的动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坚持去做一位用心的爱书者，成为一名优秀的读书人。

以曲叙事书楷模

——谈《向天开路》的艺术架构和真实还原

■刘红梅

下庄的故事，被许多作家精彩书写过，再精彩的故事如果重复叙述，也会让读者疲惫。相信每一位作家都想写出不一样的下庄故事，但要讲出下庄的新意和深意，何其难矣！

近期由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向天开路》，不仅是用文学笔法写真实故事，赋予真实内核以艺术渲染，更是用独到的结构、更为细腻的笔触对下庄进行了一次全新的书写，既让真实的故事如活态的史画展现在读者眼前，又揭秘了其他作品没有写到的——下庄的未来，以及下庄人的精神和灵魂。

丰富的叙事托身巧妙的篇章构思，使本书在相同题材作品中具有独创意义。下庄修路的故事已经被新闻、散文、小说、剧本等多种文体反复书写，《向天开路》这本书没有循原路讲述，而是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第一部分就用“新娘”“遗孀”“姑娘”这三个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状态的“井里女人”来讲述下庄的历史沉疴、修路的艰险和对下庄未来的期许，用个体命运来折射时代命运，写下庄，也是写中国，写下庄人，也是写奋斗不息的中国人。

在章节的设计上作者也独辟蹊径。第一章写的是下庄女性的柔韧与刚强，于平凡中闪现的光辉，用“小夜曲”来比喻，既巧妙又妥帖；其后的章节用“奏鸣曲”来书写开辟天路的艰难与悲壮，用“狂想曲”表现天路修通后，永不停步的下庄人在第二条天路——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奋进昂扬；再后是“浪漫曲”，书写下庄人在第三条天路——打造旅游特色经济的大道上迈步向前的幸福与喜悦。

小夜曲、奏鸣曲、狂想曲、浪漫曲、协奏曲、随想曲……这些有柔情有激情有豪情有悲壮的乐章，每一种曲调所串起的，是故事主体的刚强与柔弱，故事情感的悲喜与苦乐，故事内容的千回百转，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本书中的叙事节奏。这种以曲述事的巧思妙计，脉络清晰井然有序的叙事风格，因为有了这乐章的串联而焕发异彩，令人耳目一新。

我几乎读过所有写下庄和写毛相林的作品，也对真实的下庄和真实的下庄人有所了解，在具体的内容展叙上我认为《向天开路》有着比较显著的特点：很多文学作品是添加主角光环，而该书恰恰相反，偏要淡去楷模身上人为添加的光环，还原人物以本真平凡的样子。例如，在《向天开路》里，毛相林就是一个苦口婆心受尽磋磨的领头人，他没有标签式的英雄言行，在作者的笔下，他也曾犹豫、也曾畏缩、也曾埋怨、也曾想要放弃，这才是真实的人，真实的毛相林，真实的基层村支书的现实困境和矛盾心理。作者并没有着力去赋予毛相林和下庄人所做的事以高大和深远的意义，而是如实道来。下庄人，凭着朴实的信念，修通路让子孙后代能够轻松走出“天井”。

这样的叙写不仅没有削减“向天开路”的卓绝，反而还原了人物的真实，让本书充满真实的感召力量。这种感召力，实实在在地激发人向前，奋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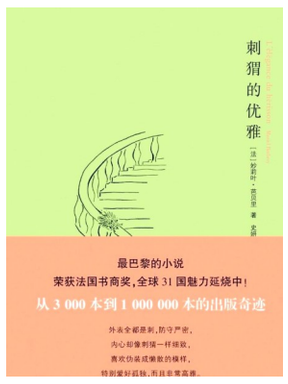
在《向天开路》中，人物的原型托出，环境的真实再现，都锁定了下庄人信念中恒定不变的“不等不靠不怕牺牲”的精神，展现出他们依托这种精神支撑起来的在不同时代却相同的美好追求。

书中的人物和场景，能够以最真实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源于作者多次实地深入的采访。本书由本土作家李燕燕和陈泰湧联手创作，在下庄，两位作家不仅细听下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还大量采访了一些关心了解下庄的“局外人”，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别人没能发现的事实和真相，然后多视角、多方位地挖掘和展现出下庄人的精、气、神。

将“路”之实意与隐喻成层递铺叙，是本书作者又一独具匠心之所在。那条挂于绝壁的“天路”，是真真实实的交通之道，而致富之路，振兴之路，则是指引下庄人奔向富裕和幸福的另外两条“天路”，是“路”的升华，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性。本书的成功之处，没有局限于对20年前修路的复述和“讲古”，在作家的笔下，下庄，作为中国乡村的一个样本，它的发展历史得到了完整呈现。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也得到了文学上的再现。

《向天开路》，不仅完成了对下庄脱贫史的记录，更构建了“抗争—突破—新生”的中国乡村成长模型，对报告文学如何平衡真实性和文学性进行了新探索。

《刺猬的优雅》：别被皮囊的标签所迷惑



■赵贵

巴黎高档公寓的旋转门每天吞吐着香奈儿套装与锃亮皮鞋，门房勒妮总缩在褪色的呢子外套里，像块顽固的污渍粘在大理石地面上。住户们嫌她佝偻的脊背破坏了大堂的美，却没人知道这个“女巫”的茶罐里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床底下堆着黑格尔全集。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用15万字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总被皮囊的标签迷惑，却对灵魂的褶皱视而不见。

《刺猬的优雅》一经推出便以200万册的销量，横扫国内外3项大奖，2009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刺猬的优雅》在法国上映。

皮囊是把锁，还是扇门？主人公勒妮的伪装堪称行为艺术。她故意把钥匙串弄得叮当作响，说话时扯着嘶哑的嗓子，甚至在账本上假装算错数字。这些精心设计的“粗鄙”，像层坚硬的壳，将她的精神世界与外界隔绝。当小津格郎第一次听见她引用托尔斯泰时，这个日本绅士的震惊，恰似我们在地铁里撞见外卖员读诗时的错愕。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借由他人视角读懂勒妮。

另一位主人公帕洛玛的遭遇更具讽刺性。这个12岁女孩能用微积分计算出母亲香水挥发的速度，却被家人当作“问题儿童”。她在日记里画满燃烧的公寓，其实是在用极端方式抗议：为什么人们只看见她的年龄，却看不见她的思想？而她真正学会去改变，是遇到了如《诗经》所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勒妮。勒妮没受过良好教育，却始终自觉修炼、自律改造，让自己成为能读书识理、完善自我的人。

刺猬的哲学中，刺是铠甲，也是边界。反观现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美术馆保安写出诗集被嘲笑不务正业，保洁阿姨在社交媒体讲解《红楼梦》被质疑博眼球。我们太擅长用外貌、职业、年龄这些可见的标尺，去丈量不可见的灵魂深度。而勒妮的杂物间藏着最动人的反差，当她在深夜读《战争与和平》，粗粝的手指抚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这句话时，皱纹里流淌的温柔，比任何贵妇的微笑都更接近优雅的本质。

这种“刺猬式生存”在当代社会有太多呼应。故宫文物修复师周小英每天穿着沾满浆糊的工作服，在显微镜下让破碎的古画重获新生；快递员雷海为在送餐间隙背诵古诗词，最终夺得《中国诗词大会》冠军。他们都像勒妮一样，用世俗眼中的“刺”（平凡职业、普通外表）守护着灵魂的柔软。正如书中所说：“真正的优雅不是晚宴上的香槟塔，而是在嘈杂世界里为自己保留一张安静的书桌。”

勒妮最终为救流浪汉死于车轮下的结局，是对可能性最有力的诠释。这个被邻居嫌弃“像牛皮癣”的老妇人，用生命最后的选择证明，普通人也能善待自己、博爱人间：皮囊可以卑微如尘埃，灵魂的抉择却能重如泰山。

“我们都是刺猬，只是很少有人愿意拔掉对方的刺，看看彼此的柔软。”或许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很简单：下次遇见“勒妮”时，先别急着给她贴标签，试着问问她，最近在读什么书。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